

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

戴一峰

(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

杨昌济是中国近代一位学贯中西的伦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是烈士杨开慧的父亲,毛泽东的岳父,亦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关系最亲密的师长。戊戌变法时,杨昌济拥护康梁变法主张,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的南学会等维新改良活动。变法失败后,杨昌济怀着用“世界之知识”以“指导社会”的理想赴日、英、德留学考察近十年,^[1]归国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专题论文《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等,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伦理学史学科。^[2]杨昌济最早全面而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伦理、哲学、教育和心理学说。^[3]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及一些有关教育的论文中所传播和提出的先进教育理念比比皆是,其中教育伦理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杨昌济的教育制度伦理思想

1. 制定教育制度的道德基础

在教育制度的制定过程中,设计者的价值取向渗透其中,使教育制度具有了善恶

作者简介:戴一峰,上海师范大学哲法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伦理学研究。

属性,制约着教育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所以,教育制度的制定必须以道德理念作为基础。立德树人是社会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根本伦理道德要求;是教育职业活动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是评价教育行为善恶是非的基本标准。^[4]教育劳动一方面承担着全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青年一代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通过塑造青少年一代的思想德性,塑造着国民的伦理道德精神。^[5]杨昌济的教育思想与立德树人的道德价值理念相互一致,他认为“教育不可不以与生存于社会之能力于个人,为第一之目的”^[6]。这里杨昌济所强调的“于个人以生存与社会的能力”就与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目标不谋而合。对于如何教育个人得生存之能力,杨昌济在当时就已经大抵从德、智、体、美多个方面提出见解了。“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于精神,不可不为大活动。而欲于精神、于身体为大活动,不可不强健其身体,即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7]“故欲对于生存竞争,与以得生存之能力,不可不与以言语、数学、科学种种之智识。”^[8]“凡教科固各有其道德的价值,教授之时,固不可不注意于涵养德性……”^[9]“美亦与真理同有使人忘苦痛之功,故教育不可不与以对于自然之美观,养关于文学艺术之趣味。”^[10]“教育又不可不养成可得贡献于社会之生存发达之性格……”^[11]关于杨昌济就如何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亦十分丰富。

2. 良好教育制度的道德价值追求

(1) 以人为本

杨昌济认为,教育应该尊重学生和教师的人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和灌输利他的思想,社会应该保障个人应有的基础的权利。杨昌济分析道:“有人而后有世界,人人有利己之心而后有世界。宗教也,学术也,社会也,国家也,推其所由始,察其所由成,迹其所以变迁发达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一心。惟利己故不得不竞争,竞争剧斯进化速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排外,排外力斯合群固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求助于人,求助于人,斯不得不有以助人矣。世之所谓道德,察其实际,孰非自利己之心而生者乎?通乎此义,而后教育之分针,可以不误。”^[12]

(2) 奉献社会

以人为本和奉献社会并不矛盾,前者是社会对个体人的尊重保护,后者是个体人对社会的高尚理想。教育制度的制定要以奉献社会为价值导向,在保障师生个体利益

的基础上,培养树立师生奉献社会的高尚理想。杨昌济阐释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之外无个人,故图个人之发达,同时不可不图社会之发达,而欲达上述教育之目的,不可不使个人发达,不可不使个人之性格高尚;同时又不可不使社会之发达,使社会之品格高尚。欲于社会为生存竞争,个人不可不尊重其社会。个人不可无公共心,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个体与社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教育除了培育个体人,还应该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将两者联动起来。

(3) 自由民主

教育制度的制定要遵循自由民主的道德价值理念,不能过多干涉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杨昌济十分重视个人的意志自由。“是固一人之行为,必由一人之意志决之;一人之意志,必由一人之智识定之。自由者,道德之本也,若一人之行为,不由于一人之意志而牵率于众人,勉强附和,则失其独立之精神,丧其判断之能力,而一人之权利,遂以摧残剥落而莫能自保。”^[13]杨昌济还将个人意志自由的权利与全体国民的权利联系起来,以此强调社会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意志自由。“夫个人之权利,即全体权利之一分子也,一人失其权利,则全体之权利已失其一分矣。若相牵相制,驯致人人皆失其权利,则全体之权利,遂荡尽无余矣。”由此,杨昌济提出教育培养国民自尊自爱、勇于担当、独立自强的精神的方法在于社会国家要破除对于教师思想的专制。

杨昌济还反对将“孔教”定位国教,载入宪法,他认为“建立国教,无益事实,徒召政争……”且这是违背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原则的。杨昌济自称:“余本服膺孔子之道,然既不欲为专字孔子,罢黜百家之愚,复不欲为攘斥佛老,驳击耶回之隘。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此余对各派所取之态度,可为海内人士正告者。”^[14]他还引用中外名言,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驳”;“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言论自由,真理乃出”。杨昌济希望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繁荣出万派争流,终归大海之相。

(4) 公正平等

教育制度的制定要尽量维护每一位受教育者的权利,给予徇私舞弊的教育当权者以严惩,以此保障教育的公正平等。杨昌济认为,对于选拔学生的升学试验中出现的走后门请人说情的不正之风,要严厉禁止,因为这种现象可呈效仿蔓延之势。“省城所设之中学及高等小学,本不足以尽收现在之学生,每逢学校招考人数众多,势不得不行

竞争之试验。如其悉以程度为标准,则被摈斥者尚无异言,若偶有一二人程度不及,因请托而获取录,则人人将趋于请托之一途,以为舍此将无复有人学之希望。”^[15]再者,杨昌济将学校风气与社会风俗联系起来,认为学校的良好教育对于提高社会道德有其助益,所以学校对待选拔学生的入学试验要严格。“愚以为欲求学生程度之齐一,则入学试验不可不严;而欲求试验之严,则必自学生自爱不妄干求、而学校秉公不徇情面始。此说果行,则改良社会之端即肇于此。夫社会之道德堕落,正赖学校有以匡之,此事甚微,关系于人心风俗者实大。”^[16]

教育制度的制定要遵循公正平等的道德价值理念,这种公平公正不仅应用在保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体,也包括教育内容本身。杨昌济曾就清政府轻视文法科的教育政策针砭时弊:“清之末造,奖励西洋学生之学理科、工科、农科、医科者,而轻视西洋学者之习文科、法科者,前者补给官费,后者则否,盖亦崇尚物质科学之意。而不知前数科者固为重要,文科、法科其影响则更有大焉者……”^[17]对此杨昌济解释道:“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18]

3. 良好教育制度制定的原则

(1) 因地制宜

教育制度的制定要依据本国国情因地制宜。杨昌济言:“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19]

(2) 与时俱进

教育制度应与时代相适合。杨昌济认为:“凡古人所立之法则,不可不按照今人之时势而判断之。何者宜因,何者宜革,古人往矣,不复与闻之矣,此法则之宜行于今日

与否,乃今人利害切身之问题。士不通今,终鲜实用。”^[20]杨昌济又言:“昨日之所谓是,今日之所谓非,不得执昨日之是以为今日之是也;是也今日之所谓是,明日之所谓非,不得执今日之是以为明日之是也。情随地而变,理随境而移,要在以吾心之明,时时判断之,时时更变之,而后能应于天下之大势,而日日进步。是故言学问者,必以研究目前之人事,为真正之学问;言教育者,必以研究目前之人事,为真正之教育。”^[21]所以杨昌济勉励同胞“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内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此通今之义之所为不可少也”。^[22]

(3) 严格章程

教育制度在制定的过程中不仅要严谨对待,而且在得到师生确信后还要严格遵守。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提出:“学校之教育宜使教授训练其他管理上一切之设施,悉遵一定之方针,以造成被教育者之品性。讲堂训谕是集全校生徒于一堂,校长训示关于全般之方针,教员可据之以立教授训练上之计画,生徒可遵之而行动。如斯而学校之方针,次第因袭至为生徒之确信,为生徒之习惯,终至为生徒之品性。”^[23]他还介绍欧美国家、日本对于儿童训谕的实例,以种种方法培养学生的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不论是普通教育还是专门教育,学校要有完善的章程,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学到有用知识。杨昌济还非常讲究“教师之法”,认为教师必须要有公正、耐心、诚实的品德,教师要博学,要有文学、历史、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要学习掌握外国语言文字,还要经常阅读报纸和杂志以了解时事。他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文学有益于修养,通科学可以扫古代之误解,书报可拟望远镜。”他还提倡教师体质要好:“教师第一要善养生,使精神有余,然后能使弟子精神震动。”^[24]所以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杨昌济在教学管理上主张实行较为严格的考核制度。

二、杨昌济的教育方法伦理思想

1. 确立正确教育方法的基本原则

(1)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

杨昌济将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真正本位的位置,并为了培养好学生而用心考量出

完善的教育方法,其中很多体现着他对于学生的关心爱护,如强调学校各项设施要注意安全、牢固,要教育学生养成各种卫生习惯,他还反对课时过多造成学生课程负担过重。对于学校的卫生,如寄宿生伙食不洁、质量太差,杨昌济建议一校设数厨房,以改善学生伙食。他还提出过很多具体设想,如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多搞小宿舍,保护学生的视力,等等。从这些细微之处,不仅看出他对于教学方法的重视,同时也可见他热爱教育事业,及对青少年真切的爱护之情。当然杨昌济也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十分关心。他说:“余思吾国今日,不仅当注意儿童之教育,又当注意于年长者之开通;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艰者之子弟图谋生活之良计。”^[25]针对不同家境和不同资质的学生,杨昌济还特别强调教师应对学生和其家庭考察后根据不同情况开展教育。

(2) 言传身教,知行合一

教师要以身为表率,为学生做出榜样。杨昌济在教给学生待人处世之道时倡导宽容乃立人要务、诚信乃立人之根基、仁爱乃立人之真义。他在《达化斋日记》中总结自己如何自存时说:“余为生徒讲张子正蒙,爱人后然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则不择地而安一节,因言余平生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三曰敬,无众寡,无大小,无简慢;四曰浑,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表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余平生循此行之,亦可以免于尤悔,始信圣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可行矣’之言不我欺也。”^[26]杨昌济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

杨昌济重视学以致用和知行统一。他曾指出:“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27]从这种知行统一的观念出发,杨昌济主张积极参与改良社会的活动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3) 平等相待,亦师亦友

教育过程中教师应秉持尊重学生人格的观念原则。杨昌济将康德、利勃斯的“人格”论和孔特的“人道”哲学联系起来认为:“法律属于民族,人格属于个人,而人道包含无数之民族和个人。”由此杨昌济提倡人们应本着人道精神尊重自我和他人的人格。他说:“人人尊重自己之人格,又尊重他人之人格,始能有真平等、真自由。”^[28]同时为

了培养学生的良好人格,杨昌济强调了思想独立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国民“毫无智识,无思想,故无舆论,无清议,无组织政治之能,无监督官僚之势,遂使少数人垄断政权,人民脂膏尽饱私囊,公众权利,断送将尽”,^[29]所以“欲唤国民,先在醒自己,己苟自觉,斯能觉世”。^[30]杨昌济又道:“必有独立之思想,始能有独立之人格。必国家中多如斯独立之人格,然后此国家可成为一独立之国家。”^[31]所以教师若要保持与学生亦师亦友的关系,一方面要在人格上与学生平等相待,另一方面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思想。

2. 良好教育方法的具体内容:教授、训练、养护、训谕

杨昌济认为要达到教育目的。“于此有三方法焉:第一教授,第二训练,第三养护。教授以授与智识、发达心身之能力为目的;训练以教育者直接与感化于被教育者,正其方向,作善良之品性为目的;养护以保护身体而发达之为目的。故养护乃关于被教育者之身体,而教授与训练,则关于被教育者之精神。教授直接活动于智的方面,训练则直接活动于意的方面。”^[32]杨昌济还从意志和认识的相互关系中入手强调教授与训练密不可分。“教授与训练,有密接之关系,吾人为教授之时,同时为训练;为训练之时,同时为教授。此事就认识与意志之关系思之,可以了解。认识与意志非别物,认识之中包意志,意志之中包认识。将认识与意志全然隔离,乃说明之便宜,抽象之结果。不包意志之认识与不包认识之意志,实际皆不能存在。今请言其理由。认识者,乃认识某物也,既认识之,则不可不心向于此物,即不可无注意,无注意则无认识。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乃不注意时之精神状态也。而注意者,意志之活动也,故认识之中包意志。又意志作用,乃心向某目的之谓也。心既向某目的,则不可无关于某目的之观念,即不可不认识其目的,故意志之中包认识。如斯认识之时,意志作用同时活动,故教授得同时为训练。”^[33]杨昌济的“教授、训练、养护”的教育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处处渗透着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教育伦理价值追求。以下是对杨昌济教育方法的简述。

(1) 教授

杨昌济认为教授最重要的目的在授予智识,其为教授的实质价值。而教授的形式价值在于图心身能力之发达。两种价值的结合乃为教授的第一目的。“吾人当并任教

材之实质的价值与形式的价值,授儿童以将来于社会必要之知识与艺术,使记忆之外,同时又应其程度发达其精神能力。此即教授之第一目的也。”^[34]

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是杨昌济所认为的教授的第二目的。杨昌济进一步解说了此兴趣的意思。“但使生徒喜闻某事,教授之功尚不足言,能使生徒闻某善事而欲为之,乃有教授之价值,故教授不可不以唤起追求之兴味为目的。”

杨昌济将教授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教师以活动或讲演、或说明,被教育者惟取受动的态度,以收纳知识,如此叫之注入的教式。其二,教师采用问答法,使被教育者参与其中,使被教育者发现关于某事项之知识,如此叫之开发的教式。其中注入的教式又分为三种:“一曰示教的教式。教师示儿童以实物或图画模型,使自直观以明了确实,收得教材,博物、理化等教科多用之。第二为示范的教式。教授者先示模范的实例,儿童乃仿之而为活动,唱歌、体操、图画、习字、读法,多用此教式授之。此专诉于儿童之模仿性,故教授者之所示所作,不可不有模范的价值。第三为讲演式教授者。连续的讲述说明,以补助儿童之不能自解或不能观察实验者,而进其了解。此教式多用于修身、历史、地理等教科,最简便易行……”^[35]

在教授的过程中,杨昌济还强调了教师所应该注意的事项。如针对开发的教式中的课题式方法,杨昌济建议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要预先了解学生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情况,因学生身体状况和课题作业的完成有直接的关系,而贫困之家的家庭房间少人口又多时学生难免要受打扰或学生要从事劳作则亦无时间完成家庭课题作业。又如针对开发的教式中的问答式方法,杨昌济强调教师不仅要通过问答式教学唤起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言语表达能力,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得知学生的长处、短处,从而便于注意学生个性的发达。这些教授方法的细节,彰显着杨昌济以人为本的教育伦理精神。

(2) 训练

杨昌济在讲义中说明了训练的目的。“训练以教育者直接与感化于被教育者,作善良之品性为目的。而方施训练之际,有二事须注意:一、宜使心意活动强大;二、宜正心意活动之方向。前者修养强大意志之谓,后者则保持纯正意志之谓也。”^[36]其中,“训练上于意志活动之方向中,最宜注意者,莫如养成社会的精神(公共心)”^[37]。

为了使得训练更为有效,杨昌济在记述具体的训练手段之前,先说明了教育者要探寻学生品性所形成的原因及还要顾虑到被教育者身体发育的程度和当时的身体精

神状态。只有这样,训练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否则可能造成训练不仅不奏效,而且还会招致学生反抗之情,以致损害教育者的威严,轻视教育者的命令、训诲及示范。又教师对学生应以诚相待,针对精神发达程度尚低的学生,宜少用教谕劝告、责罚和功课,而多用命令禁止、奖励和游戏。乃学生精神发达渐进者,则可以稍设定一般的规则来教导其处理事务行为。又精神发达再渐进的学生,以至自身形成一种立身处世主义的,则教育者宜监督其行为,临机应变,忠告善道,并使读高尚传记,扩大理解自己与他人及社会的有机关系。

(3) 养护

杨昌济将养护分为两类。“有积极的养护,有消极的养护。前者助身体之发育,后者防身体之损害。如课儿童以游戏、体操、手工劳役,此运动身体而助其发育之手段也。注意于学校卫生,以防一切之疾病,此保护身体而防其损害之手段也。积极的养护,或又谓之锻炼身体,习勤劳,忍苦痛,耐饥渴寒暑,皆锻炼身体之作用。”^[38]杨昌济又举了大量消极养护的实例呼吁教育者注意。“如刀剪之类宜慎藏之,无使儿玩弄,以至误伤。又如缘木、乘墙、攀岩、跳涧等危险之游戏,皆宜禁止。运动场中所设备之天桥等运动器具,若无人监护而任儿童自用,亦时有危险之虞。教室、寝室等不宜在楼上,在楼上者梯级必宜宽平稳固。又儿童好骑于楼梯扶手栏杆之上滑下以为戏,以亦甚为危险之事,宜特作圆形木钉以防其滑走。乡间小儿喜在塘井溪涧之中游泳,往往溺死,故儿童通学于其往来之途中,亦不可不大为警戒。又在城市之中遇火警之时,全校儿童宜由教员率领,整队而出,不可拥挤夺门,以致践踏伤命。此事亦宜于平日练习,庶仓卒之时,无不测之祸。又学校墙屋倒塌伤人性命之事时有发生,此亦养护者之责任也。”^[39]又例:“一、不可打击儿童之头部,致伤其脑,转成痴钝。二、不可打击儿童之耳部,恐震破鼓膜,致成重听。三、光须来自左方,读书之时,书与目宜有适当之距离(一尺二寸为最宜),黑板上及读本中之字,均不可太小。不许于黄昏之时、黑暗之处看书。四、桌椅均须适合儿童之身体,椅不宜太高,儿童之足,务须平稳踏地,不可悬空,致胫骨弯曲。桌不宜太低,致养成曲背之癖。五、有传染病之儿童,不许来校。六、写洋文之黑水有毒,不可使人目,不可使入口。此乃教育上之养护所宜特别注意者。”^[40]杨昌济还就学校后勤管理处提出养护建议。“故欲求饭菜之改良,不如多设小寄宿舍,即在一学校之中,亦可分设数厨房,招数人承办,而庖人不可不慎为选择,职员不可不勤于检查。”杨昌济的养护理论十分契合现代教育理念,其记述的养护方法已在现代教

育中被广泛采纳应用。杨昌济在当时国民教育尚处在不发达境遇中就能提出如此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办法,原因在于除了他在留学期间认真学习考察外,更重要的是源于他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伦理精神的支撑和以教育来立德树人奉献社会的人生理想。

(4) 训谕

在这里杨昌济所讲的训谕情景特指学校全体会议。“学校之教育宜使教授、训练其他管理上一切之设施,悉遵一角之方针,互无齟齬,彼此相辅,以造成被教育者之品性。讲堂训谕乃于此事发挥其价值者也。集全校生徒于一堂,校长(或主事)示关于全般之方针,教员可据之以立教授训练上之计划,生徒可遵之而行动。如斯而学校之方针,次第因袭至为生徒之确信,为生能之习惯,终至为生徒之品性。要之,讲堂训谕乃作画一之品性、风骨共同意识者也,而此共同意识旋为舆论、为校风。故讲堂训谕于奏成校风上甚为必要。”^[41]杨昌济言讲堂训谕宜注意,“乘好机提示活知识,高子弟之理想。使其判断正确,以指导其实践。故选事项与择时机为最为紧要,从而其方法亦宜应于事项,而或谨严,或爽快,或沉静。谈话所用之直观物品,亦与普通之教授同,不可怠于其准备,因如此则可使得更深之感兴也”。^[42]

3. 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协调并进

杨昌济以古人举例说明仅以家庭教育培育人才是不够的。“古人之于子也,有易子而教之义焉,有出就外傅之制焉,诚以单纯之家庭教育,不足以养成知类通达之人才也。”^[43]所以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一道构成了相对完备的主客体教育体系。一般而言,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个体人受教育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人生阶段,而学校教育对个体而言亦是十分重要的。三种教育方式或教育场域不仅在个体受教育过程中相互补充协同发挥作用,且于国家社会而言更是促使其形成一种健全良好的运作体系的必要途径。杨昌济分析了学校与社会教育对于国民和社会的作用。“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欲改良风俗,不可不注意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所以充足国民之实力,社会教育所以鼓舞世界之动机。学校教育主于严整平实,社会教育主于活泼高尚。形式而论,则学校教育者主也,社会教育者辅也。”同时,杨昌济着重强调了社会教育对一国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精神而论,则社会教育者始之有组织学校教育之原动力,继之有监督学校教育之持续力,终之有改良学校教育之猛进力。专恃学校

教育而无社会教育不足以立国,至易明之理也。学校教育变之自上,社会教育变之自下;变之自上,不可恃者也,变之自下,可恃者也。大抵各国变法,皆从民起,不从社会教育下手,而欲倚赖官力以兴学校教育者,至难之事也。中国两千年来,无学校之教育,惟恃仁人君子,以其学术行谊旌式国人,维持世道;社会教育之有效,自古已然矣。”^[44]由此,杨昌济言明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还要注重发挥社会教育的先导力。

杨昌济认为,社会教育的方法之一是在为更广大受教育者群体设立夜班以此来供他们学习。“故今日言教育者,不当徒置重于学校教育,亦当注意于社会教育。设文科法科之夜班,乃社会教育之一方法也。”^[45]杨昌济解释道:“余思吾国今日,不仅当注意于儿童之教育,又当注意于年长者之开通;不当徒为身家殷实之子弟图远大之前程,尤当为家道维艰者之子弟图谋生之良计。欲开通年长者,当多设关于文科、法科之夜班,如伦理、教育、论理、心理、政治、法律、理财诸科,皆宜特设夜班,使年长者入之,可以增长见识,破除误解。”^[46]同时杨昌济认为这样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为社会扩充中等阶层群体的规模,而中等阶层对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盖国家之所以立,全在有健全之中等社会。有健全之中等社会,则上可以监督上流社会,使不至过于专横,下可以指导下流社会,使不至趋于暴动。”^[47]所以为了扩充国家中等群体,保障国民参政权,提升民众议政能力,杨昌济认为发挥社会教育对市民开展普通教育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吾国专制既久,创建共和,于市民之教育,尤不可不以全力注之。国民有参政权,不可无参政之智识与道德。……非有改造人心之教育,养成健全之中等社会,则善良之政治终不可得而望。有志者所宜奋袂而起也。”^[48]

在家庭与学校教育的联动上,杨昌济通过在英国的留学考察经历,借鉴了英国教育的有益经验,提倡国民教育推行通学制度。“此地学堂办事人、教员、生徒皆在家食宿。除授课时间之外,堂中空无人,故用人极少。校仆不过一二人,其任扫除之役者,则临时雇用者也。此通学制度,吾国急宜采用。”^[49]杨昌济认为通学制度的好处是一方面学堂事简,易于办理,且对于家庭来说,可减轻学费负担;另一方面,儿童不离开父母的监督,对于自身德育发展有益,毕竟群居终日,易染恶习。当然,杨昌济也考虑到离学校较远的学生的住宿问题,所以他提倡仿效英国的寄宿制家庭的方式。“至如厄泥北淀市,除家居市内者由家通学外,凡自乡村小镇来学之学生,各觅一居停主人寄宿其家。此等居停主人,即寻常人家,非如中国客栈之组织。寓其家者与主人同饮食,相待如家人。此等风俗,为吾国所未有,然可提倡而仿行之。”^[50]对于寄宿家庭的选择

上,杨昌济说明道:“此间亦有为学之特别寄宿舍,亦有学堂指定可以寄宿之人家,但居住与否,听学生之自由,不加强制也。如欲实行通学制度,则宜组织一寄宿舍,听学生之愿入者居之,又宜商定多数人家之愿寄寓学生者,与之约束,并略定膳宿之价值,以便学生之愿寄寓人家者居之。”^[51]

三、杨昌济的教育内容伦理思想

1. 以“人生观”“世界观”“信仰观”培育为教育根基

(1) 人生观、世界观

个体对于自我和世界的看法在于个体的思想,杨昌济言:“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有思想,而人品所以有圣贤庸众之分,亦以其思想之高尚或平凡而区别之。思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中先发一种思想,然后实现之于行动,个人有然,民族亦有然;个人有个人之主义,民族有民族之精神。无有个人而无主义者,亦无有民族而无精神者。惟主义有纯驳,精神有盛衰而已。”^[52]

杨昌济认为,个体对于自身和世界的看法关系到个体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他告诫人们:“务取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种种问题,一一加以新研究、新解释,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思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地位,审思自己对于斯世当取如何之态度。在一己则立一贯通一生之理想,在一国则立一百年远大之规画。”^[53]

个体对于自我和世界的看法会形成个体自身的主义,杨昌济十分重视并将其与公共心联系在一起。“社会之成员,有确信不枉自己之主张始能有强社会,故教育当养成于必要之时牺牲自己利益之精神,又不可不养成有确信、有主张之人,不可不养成有公共心之个人主义之人。此于个人、于社会皆为有益。”^[54]

(2) 信仰观

雅斯贝尔斯说:“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他特别指出:“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55]杨昌济认为民众的信仰不可侵犯,他举例道:“人皆谓吾国无宗教,其实所谓儒、释、道三教皆具有宗教之性质。吾乡数年必打醮一次,此数日之中,合境皆持斋戒杀,道士代民祈祷,表忏悔祈福之意。此亦美俗,于风教不为无补。而躁者辄欲执无神

之论以反对之,是诚可以不必矣。近日办学堂者,往往浅躁而不知大体,纵学生痛诋敬神之为迷信,不知众民之信仰不可轻犯也。往往激怒乡人,致有焚毁学校之事。”杨昌济还概括道:“总之,信仰与游戏,乃人性中固有最真挚、最迫切之要求,非可以法令论说破灭之者,人能知人情之真相,斯可以知支配社会之道矣。”^[56]

杨昌济借用诗来尔马哈的宗教哲学思想来说明宗教与其他信仰之间的相似性,认为诗来尔马哈的宗教哲学与张载的道相似,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亦有相通之处,还与康德的人格论有着深刻联系,杨昌济称赞道:“诗来尔马哈于彼之宗教学实开一新纪元。彼谓宗教自身之真领分,存于感情之性质之中宗教乃于感情之范围内无所限制、统御吾人者也。宗教之本质为直觉,无限绝对之存在直启示于感情之中,使人为宗教之人者,实感情也。感情乃人格之中心也,精神之生活之中心也,而宗教之感情又为一切纯洁之感情之根源。宗教之感情乃依存绝对之感情也,依存神,依存与神同体之宇宙。宗教实由望无限之感情而生,乃对于绝对之统一之冲动也。”^[57]杨昌济认为“诗来尔马哈之宗教论,实能直触宗教之本质”。“诗来尔马哈谓依存之感情,决非萎靡自己之意,与卢梭所言服从法律决非屈服,其意正同。张横渠曰:‘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于道,大于我者,容不免狂而已。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乎身,则藐乎其卑矣。’横渠之所谓道,与诗来尔马哈之所谓绝对相似。”^[58]

杨昌济通过对诗来尔马哈的宗教哲学的阐释及与张载的“道”的思想的类比,提出:“不立我则无本,执我又失之不广。此乃主张人格论者所不可不知也。”^[59]杨昌济称赞康德人格论“实为伦理学说之中坚”。“康德谓人格乃有绝对之价值者也,与其他种种事物之价值大不相同。其他之事物必为方便始有价值,仅有相对之价值而已,乃关系于自其事物而生之利益自其事物所与之快乐者也。是等事物,可得以能生相同之结果者互易之。然有绝对之价值者,其自身即为目的,而不为他物之方便。如斯之物,非可以他物互易者、为如斯之自己目的者,即人格也,此乃真可尊敬者也,有无条件之品位价值者也。不问为自己之人格与为他人之人格,吾人不可不以人格自身为目的而处置之,决不可以人格为其他目的之方便。”^[60]在这里,杨昌济所阐释的康德的人格论的含义是偏向于从个体成就自我的人格出发的,即杨昌济所说的立我;而他笔下的诗来尔马哈的宗教哲学与张载的道则从万物一体的角度说明了个体人不必执着于我,执我则无法通往无限。两者相合,即杨昌济所言的立我而不执我。

杨昌济曾记述了启蒙派学者对于宗教和迷信的看法。“彼等以为神之存在与灵魂

之不灭,乃吾人之理性可以了解者也,而信仰此二者,则为自然的宗教、理性的宗教。理性的宗教乃惟一的宗教也,其他诸天启(假天为名)的宗教,则于上所述二条之外,更有其他种种之信条,而此等信条多为迷信,如此之迷信,乃无关于宗教之本质之细事,以此相互争斗,愚亦甚矣。”^[61]杨昌济以自身的观念亦区分了“迷信”和宗教,认为:“夫迷信诚有弊,而宗教心要为不可缺者。任教育者但当徐以学理去迷信,而以至诚养普通信仰之心,断不可有躁迫之举动也。”^[62]杨昌济将宗教心和信仰之心联系起来,虽然他并没有说明宗教心为何物,但既是与宗教挂钩,那么此心当含有宗教的精神,比如对于未知存在的敬畏、对灵魂和生死轮回观念的了悟等。

2. 中西优秀文化融合并举

(1)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首先杨昌济认为一国传统文化是国民精神的体现和传统,也更为本国国民所理解和吸收,所以要重视守护。“盖一国文学,乃一民族精神之表现,风俗、习惯、思想、行为,各国民之间有甚大之悬隔。一国文学之趣味,固非他国民之所能深解也,故欲陶冶青年之心性,不可不有赖于本国之文学。”^[63]“然各国学校虽重实科,古文之教授亦尚不废,国民自古传来之精神的财产,固不可不珍重而保守之。”^[64]其次,杨昌济十分肯定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对国民的积极作用,呼吁学者开采发掘。“彼为德育之计,且课学生以汉文矣,况吾国经书之所载,乃吾国固有之文化,其关系于青年之德育尤为深切,而可忽焉不讲乎?”^[65]“吾国有固有之文明,经、史、子、集义蕴固深,正如遍地宝藏,万年采掘而曾无尽时,前此之以未能大放光明者,尚未谙取之之法耳。今以新时代之眼光,研究吾国之旧学,其所发明,盖有非前代之人所能梦见者。”^[66]再次,杨昌济还提到了一国传统文化对于国民了解国家热爱祖国的意义,“深于本国之文学,则知本国有固有之文明,起自尊之心,强爱国之念,且对于国内之风俗习情均能知其起源、悉其意义,对于祖国既不至发生厌薄之感情,对于国俗亦不至主张激急之变革,此真国家存立之基础,不可不善为培养者也。”^[67]最后,杨昌济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批判。杨昌济认为:“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68]如“姑鞭妇至死而减论,妇人敖荡者沉之于江,子殴母而死于杖下”等事实,“此皆过重伦理而轻民命,不可为典要者。西人迷信宗教,焚杀异教徒,

亦同此弊”。^[69]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杨昌济强调要对其取其精华,比如:“经文如《书经》《易经》,多古奥难解,不适于为教授之材料,一也;时势变迁,古义有难适用于今日者,二也;大学之文科固不妨博稽古典,至普通教育则当由明习经术之士,取经说之极精要者,编入国文教科书及修身教科书之中,而未可如前日之漫无抉择,全行记诵。此则余对于学校读经之意见也。如必欲以读经示尊孔之义,则专读《论语》或尚可行,因篇章不多,文义浅显,尚不致过重儿童之负担。然愚意终以为即《论语》中,亦有不必读者。……其他各经可采择教授者甚多,如《诗经》之诗,有可选入国文读本者,《礼记》中之言礼意者,可作中国伦理教授之材料,无读经之名而有读经之实,在施教者加之意而已。”^[70]

(2) 融合国外优秀文化

杨昌济十分重视优秀文化之间的融合互益,他鼓励国人能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贡献力量。“吾人处此万国交通之时代,亲睹东西洋两大文明之接触,将来浑融化合,其以生之结果,盖非吾人今日所能预知。吾人处此千载难逢之机会,于世界人类之前途,当努力为一大贡献。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非合多数人之聪明才力累世为之,莫能竟其功也。”^[71]

3. 人文为先、科技为实的教育内容原则

杨昌济认为,在具体开展对学生的教育中,所授的教育内容要遵循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相备的原则,且要把人文知识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今之学校教育,似有重实科而轻文学之倾向,又似有重外国语而轻国文倾向,前者则实利主义之影响,后者则欧化主义之影响也。夫教育不可不养成社会有用之人才,不可不授与科学之智识,不可不养成必要之技能固也,实利主义论者之所提倡,固亦余之所以为不可少者。然若专注重于此,而以文学为无足重轻之事,遂阙焉而不讲,则余之所不敢赞同者。顷者留学东西洋者众矣,其成绩优良,多为国文、国学有根柢之人。……国文优而科学不优者有之矣,未有科学优而国文不优者也。此亦经验之言。近世人士鉴于中国之贫弱,由于物质科学之不发达,遂发愤而倡物质救国之论。其救时之苦心,固吾人所同感,然若忽视精神之修养,则物质科学亦终无发达之期。此等问题,皆关系国家生存发达之大问题

也。畸轻畸重,则社会将受其不良之影响。”^[72]

4. 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

杨昌济言明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个人成才,还要让个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因为“如斯社会与个人有密接相互之关系,故欲使社会进步,不可不使个人进步;欲使个人进步,不可不使社会进步。如斯教育,宜以社会为目的。视个人之利益与专以个人之利益为目的皆非也,教育不可不同时谋社会与个人之利益。如斯然后可以谋社会之利益,又得谋个人之利益,即教育不可不为社会的,同时又不可不为个人的”。^[73]其二,“吾人又自为社会的生活,始能浴社会之恩泽。如斯社会为吾人所必不可缺者,故吾人又不可不贡献力量于其生存发达,而在教育不可不与图社会之生存发达必要之性格于个人”。“易言之,则个人不可无公共心,此社会生存发达必要之条件也。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盖公共心不仅为社会生存发达不能缺者,根本的言之,无公共心则社会不能成立。”^[74]杨昌济在这里所说的公共心即是指个体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责任而言的,其中他不仅以自我的理解来解释了这种责任来源的原因,还言明了群体公共心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

杨昌济还通过阐释孔特的人道哲学来说明爱国和爱世界的缘由及一体性。“人道者,实自人类相互之交涉而结成之一大精神生活也。贡献于普泛之秩序之完成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人类之结合,即人道也。此人道有二本质之属性:结合性及永续性是也。社会中一切成员之作用互相补助,互相结合,而成一大秩序,一见虽似各成员为己而单独活动,其实乃贡献于全体之活动也,此结合性之特质也。与此特质相并而尤为显著者,则为永续性。今日之人道,乃古来之人道之连续也,人道乃有历史者也。在过去时代社会之精神生活,传于现在之人道之中。人道非但由现在生存之人类而构成之,实由多数过去之人而构成之也。贡献社会之进步、补助人类之发达者,乃永久不死之人也。人道永续,吾人之精神不灭,古来英雄豪杰之精神,今现存在于吾人精神之中。”^[75]

杨昌济不但用孔特人道哲学的思想来说明人类的一体性,同时还将孔特的“人道”与德国学者利勃斯的“人格”联系在了一起。利勃斯的“人格论”是在康德“人格论”的基础上发挥而来的,利勃斯在康德“人格论”基础上认为他人的人格与自己的人格是相

通转换的。“他人之人格乃自己之人格之变容者也。我等对于自己而有所尊重,则对于他人亦不得不尊重之。真正之主人,必恶奴隶主义,必恶他人之对于己而为奴隶与有奴隶之行。反之,欲使他人之奴隶者,其人即有奴隶根性。”杨昌济也高度称赞了利勃斯的“人格论”。“人人尊重自己之人格、又尊重他人之人格,始能有真平等、真自由,重人格而不重幸福,乃有道德之威严。此乃伦理学上正大之学说也。”^[76]杨昌济将人格与人道联系起来,则爱国与爱家自成一體。“人格者,一个人所有之人格也。而人道则包含无数之民族、无数之个人于其中。重人格必重人道,爱国家必爱世界……”^[77]

在增进人们的家国观念、世界眼光上,杨昌济主张必须要读书看报,了解世界的形势,把握社会的动态,“日日报,则心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而愈厚,且得有种种之常识,积累久之则深明世故,可以应无穷之变,投其所向无不如意。此真精神知识之营养,如饮食之不可缺矣”。^[78]

5. 良好教育内容的具体体现:德智体美多面发展

杨昌济认为,学校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此二者所用教科不同。杨昌济不仅分析了普通教育的各科所应采取的教学方法,还阐述了普通教育的各科除了自身具有独有的价值效用之外,其功用也相互联系,这体现了多学科教育在育人上的综合作用。杨昌济期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各科的相互作用和联系予以注意重视,从而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以下是普通教育所用教科:

(1) 言语科

杨昌济认为:“言语之目的,在养成理解他人之思想与发表自己之思想之能力为目的。”所以,杨昌济基于此目的分析出言语科在教授智识和养审美、正直、爱国之心等作用。“如斯言语科以授关于言语之智识,养成关于言语之技能为重要之目的。然谈话及文章之内容,乃事物之智识,故同时又为智识的教科。即教言语之时,可授数学、修身、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之智识。故教师于教授言语之际,授关于言语之智识,养关于言语之技能同时又不可不授与诸科正当之智识,与养正当之心情。”^[79]杨昌济又举书法的练习可以养正直之心的例子来说明言语科具有可以锻炼精神诸能力之价值。“又于作文之时,不可不求其文法之正确,授外国语之时,尤宜特为注意,如此则可养精密之德。教修辞学使作美文,又可养成美感。又使生徒学古典之时,可养成记忆、想

象、审美心、道德心。至于使学本国之古典，则于养成爱国之心尤为有效。”^[80]

(2) 数学科

杨昌济认为，数学除了为一切科学之研究为必要的实用价值外，还有多种价值效用。“理解数学之问题，要想象力。理解几何学之问题，要关于空间之想象力，故可发达想象力……”“于数学教授，不但要记教授之材料而已，此外又不可不诉于生徒之悟性，使忍耐思难解之问题而解明之，故数学之教授，有作强固之品性之价值。又数学之真理绝对真实，毫无例外，故学数学不可不服从绝对。对数学的规则，有绝对服从之习惯，则对道德律亦如此。故数学教授，有养成绝对服从道德规则正直之人之效力。”^[81]

(3) 修身科

杨昌济认为，修身科不仅要教人明善恶之别，还要养人之道德心。“欲为善去恶，必先明善恶之别。而知何以某事为善、某事为恶之理由，于为善去恶有大效力。然虽知善恶之别与其理由，吾人非必实行之。自道德之智识，移于道德之实行，必先发生关于道德快与不快之感情，故欲其自好为善去恶，单授智识尚为未足，不可不养道德心。”^[82]

杨昌济将修身科养人之道德心的方法大致归为：“一、教师躬行实践；二、勿重复教导以避免生厌；三、提出具体事实；四、以优美文章教导；五、举各地良风美俗；六、唱有道德内容之美歌；七、就思想之问题与以正当之解释；^[83]八、注意学生所读之书，防范学生获取恶的思想。”

(4) 历史科

杨昌济认为：“于历史科不可不授以本国及外国之历史的事实，并历史的事实之原因、结果，因使得社会之变迁与国家成立发达之概念，兼养国民的思想。此外，又宜述伟人之事迹，使生徒注意伟人之性行，以涵养其德性，知历史上重要之事实，并自伟人之性行，涵养生徒之德性。此各级皆不可不注意者，于少年之教授尤宜注意。”^[84]

(5) 地理科

杨昌济从自身对于家乡之情感乃起爱乡之心进一步谈到地理与爱国的关系。“吾人对于乡里、对于存于其中之物，有可怀之感，虽一木一石，若吾人幼少之时游于其侧，虽知此物为无情者，吾人亦对之有情。乡土之亲接，乃起爱乡心之原因也。本国山川、都会、村落，种种现象可以养成爱国心。故地理教授授与智识，同时不可不养成爱国心。”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杨昌济以历史科类比地理科。“历史教授固宜养成查考地图

之习惯,地理教授尤不可不注意;又地理教授,务必使比较新旧观念,使得新明了之新观念。”“又地理教授宜授历史的事实之大要,有名之诗歌、文章、纪行皆可助地理之教授。又生徒感趣味之事与现教授之事相关之时,则宜并说之。又务必示生徒以标本、图画、写真,使得关于地理之趣味,又得明确理解。”^[85]

(6) 博物科

杨昌济在留学期间认真考察过西方的教育,所以他对博物科所用教学之法亦很熟悉。他所记述的博物科的教学理念除了思想先进之外且与美学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博物科不但授事实,又不可不授支配事实之理法、自然界复杂之关系。”“又普通教育之博物科,不但授关于动、植、矿物之事实与理法,又不可不养种种之能力。例如,正观察、正记载之能力,不可不养成之。故博物科教授之际,宜示实物于儿童,诉之于其直观。”“又如斯使儿童观察之后,宜使以绘画或以文章、谈话发表之。博物教授,又宜使练习自多数之事实、归纳一般之理法,发见理法之方法乃重要之事。又各地固有之景色,多基于存在各地之矿物、岩石、植物、动物,故动、植、矿物之种类与分布状态、生活状态,宜使生徒于郊外自行观察,使起爱自然之心。又示一切美物于生徒,可养生徒之美感。”^[86]

(7) 理化科

杨昌济一方面记述了该科的蕴意和学科目的及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将该科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授存在于自然物、人工物之理化的现象,并支配之之法,乃理化科之本务也。此等现象与法则,务必以实验示之于生徒。又简单而无危险之试验,宜使生徒自为之,如是则生徒就理化学多感兴味。”“博物教授宜置重于儿童目击之事实,理化科亦然,就儿童周围理化之现象说明之,使之理解周围之自然界并社会之文化,乃必要之事也。”^[87]

(8) 唱歌科

杨昌济认为歌唱和涵养德性密切相关。“养成发调音、听调音之能力,乃唱歌科之目的。故唱歌科有练习耳与发音机关之效,此外又有使儿童高尚其品性之力。注意于歌词与曲谱之选择,可涵养生徒之德性。吾人关于道德之智识,移于道德之实行,不可不经道德的情操之阶级,不伴以道德的情操之智识,不能为实际之动机。唱歌于养道德的情操有大效力。”^[88]

(9) 图画科

杨昌济认为图画科不仅可以养美感,还可培养想象力和好的习惯。“养成表出吾

人之表象(观念)于平面之上之能力,且求其表之正确、精密、优美,乃图画科之目的也。又自为图画及评赏他人之画,可以养美感。又考案之教授可养想象力。无论何等图画,皆可使四肢敏捷,又有养自动的习惯之效能。”^[89]

(10) 手工科

杨昌济认为手工科和图画科有相似的作用,即培养美感和创造想象力及观察力。除此之外,手工科还能获得制造简单器物的能力和养成勤劳的习惯。

(11) 体操科

杨昌济认为,“体操在助身体全部之发育,整齐其姿势,坚固其筋肉,使动作灵敏。且教授合宜,可以养勇气,励志操,强自信之念,并能养成守规则、忍耐、克己等习惯,皆其效也。”^[90]

四、杨昌济的生命教育伦理思想

1. 理解尊重生命

(1) 自利

杨昌济关注理解着人性的需求,使得他重视保护个人的人权,认为中国古代某些关于利己的思想是误国误民的。“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丧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蘸贼,而奉为圭臬,无敢或逾。甚矣,吾国人之不明真理,徒以名为义而不察其实也。名为善则相劝为之,虽亡国亡种,而莫知其非;名为恶则相戒不为,虽亡国亡种而有所不惜。为古人之奴隶,为习俗之奴隶,百利无自而兴也,百害无自而除也,乃不得不为天行之奴隶,不得不为异族之奴隶。”^[91]

杨昌济以逻辑分析法从个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利己思想的合理性。“吾国民族之所以积贫积弱,沉沦于苦海而无能自拔者,一言以蔽之,则曰为学说所误而已矣。有人而后有世界,人人有利己之心而后有世界。宗教也,学术也,社会也,国家也,推其所由始,察其所由成,迹其所以变迁发达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一心。惟利己故不得不竞争,竞争剧斯进化速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排外,排外力斯合群固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求助于人,求助于人,斯不得不有以助人矣。世之所谓道德,察其实际,孰非自利己之心而生者乎?”^[92]

(2) 破执

在对于个体生命的认识上,杨昌济强调为人父母不可将子女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个体人首先是自己生命的体验者,而后个体人才是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的人,其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责任义务。“吾国人从前国家观念不甚发达,往往视其子为私有之财产,遂至有上文所举养儿待老之谚。如此,则生子纯以自利,不得为高尚之思想。须知子固为我之子,同时又为国之民。教育吾子,非徒自利,即所以造就国民。此吾人对于国家之义务也。”^[93]

2. 独立自主,发展生命

(1) 自助

人生在世,应以独立自强。杨昌济言,人不可作为子弟起依赖父兄之心,人不可为父兄有依赖子弟之心,兄弟不可互相依赖。杨昌济解释道:“受之者既大损其独立自主之精神,施之者亦不免养成倚赖根性之失。偏于厚亦君子之过也。”^[94]

(2) 婚姻

杨昌济反对早婚之俗,因婚姻双方应具备赡养家室和操持家政的能力才可步入婚姻。“今不问其子有赡养妻子之能力与否,而汲汲为之成家。成家之后,其子不能自谋,乃不得不仰赖其亲代负赡养之义务,此家累之重,常人所同叹也。”^[95]杨昌济还鼓励夫妻结婚之后,自立门户,以求自立。杨昌济反对一夫多妻制。“夫吾国人之主张保存纳妾制者,莫不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其极强之理由。乃有人儿女既已成行而纳妾者,或其妻虽未生子尚有生子之希望而纳妾者,此又何说乎?吾发此论,必为多数人之所骇怪,然余实见夫并世之人,多有因未能制欲多纳偏房,既酿家庭之不和,复来生计之困难者,以为诚有思虑之人,断断不宜出此。”^[96]杨昌济还解释了纳妾是违反人道的。“人格平等,社会中不应有奴隶一种人,妾亦奴隶之一种也,妾在社会交际之间,不得与妻匹敌,其人格不完全。社会中尚存纳妾之制,则已剥夺社会中一部分之人权,观俗者所宜深省也。且纳妾则对于妻之爱情不专,其酿家庭之不幸,有不可胜数者。夫妇之道苦,亦制度不良之所致也,故此制宜改。”^[97]

(3) 择业

杨昌济强调要慎选职业,针对国人多追逐政治官吏一途,他联系经济学原理发表

了自我的见解。“今日之中国，承科举时代之积弊，才力稍强、欲全顺之首，群趋于官吏之一途。求过于供则物价上腾，供过于求则物价下落，此生计学上之公例也。今官吏止有此数，而求官者多至不可纪极，是供过于求也。供过于求，则物品必有滞销之时，求官者百而得官者一，私人之损失固甚大矣，而国家之损失尤大。向使以此多数人求官之心思日力，而用之于开发地力，扩充实业，则其所生之利，必有百倍千倍于今日者。吾观今之人徒知谋生之为急，而不知所以谋生之方，乃误认作官为一种职业，运滞销之货而侥幸万一之利，其智不亦甚矣！今者国体虽号称共和，而人民参政之权则犹在若有若无之间……”^[98]杨昌济还以满人举例来说明人们趋于官途的问题。“前清限制旗人不得营农工商之业，惟得为官与兵。经二百余年，满人乃尽失其生活之能力，几几乎无以自存。”所以杨昌济乃言：“余恒劝亲友宜勤求一门专精之学问艺业，不可恃两局为生涯。我有学问艺业足以自立，但有人求我之事，而不必有我求人其事，岂不甚快。此亦选择职业者所不可不知之义也。”^[99]

(4) 惜时

杨昌济在谈到惜时的观念时曾举谭嗣同延年会例子来应对无谓之应酬。“昔谭复生在长沙，曾创延年会，欲联合多人，将无谓之应酬，一概省去，彼此相谅，无复猜疑。其所以名为延年会者，谓人生年寿之长短，与其作事之多寡为正比例。作事多者，虽天亦寿；作事寡者，虽寿亦夭。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可以延年矣。”^[100]对于惜时的原因解释，杨昌济言道：“凡事有可于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101]

(5) 戒赌

杨昌济区分了游戏和赌博，并反对赌博陋习。“赌博者，一种之游戏也。游戏之冲动，乃人人之所有，独具以财物为孤注，乃大有害于治生。近日斗牌之习流衍全国，不染此习之人寥寥可数，所谓巨人长德、旷世人豪者多不免此。虽已悬为禁令，然耻尚失所，禁绝为难，甚非兴国之气象也。上流之人，因博而负，则临财之际不免苟且；下流之人，因博而负，则饥寒迫身，流为盗贼。余尝谓吾国之宜戒斗牌，一如吾国之宜禁鸦片。”^[102]

五、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的意义

1. 促进教育体系的发展

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对当代的教育事业建设有着积极的价值。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奉献社会、自由民主、公正平等的道德理念和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严格章程的原则规范,其为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在教育方法上的体现则是强调教师在以人为本、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同时,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倡导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种教育方式或教育场域,要相互补充,协同发挥作用,并且呼吁发展社会教育对普通国民在普及性教育和参政议政中的作用。

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在教育内容上不仅体现了对学生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关注,同时还教导学生心怀祖国、奉献社会,建立抱负与理想,承担社会责任和担负时代使命。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倡导奉献社会的教育伦理思想,是现今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教师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杨昌济所重视的那样,教师自身提高品德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杨昌济倡导教师要博学身教,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身道德品质和教学能力,另一方面,杨昌济强调针对教师的选拔和考核要严格规范。

2. 对培育学生品德才能的作用

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倡导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鼓励学生以人文精神为基底,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增强自身的意志能力,同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去参与社会实践,经世致用,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做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包含有“仁义礼智信”品质的人。

杨昌济以民主的态度与学生们探讨紧迫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努力把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志愿传达给学生们,这种独立、平等和自由的信念深深地激励着学生们。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促使我国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新民学会的成立,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对于中国反封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事业贡献良多。

3. 对促进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意义

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体现了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发扬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宣扬,这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文化学习观念更为后人所吸收采用,不仅对促进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先进文化的传播有帮助,使得民众思想活跃、思路广开、民族发展、社会发达,也将因为民族之间进一步的交流了解而为世界和平增加大的助益。

4. 对塑造人们信仰价值观的作用

杨昌济的教育伦理思想的意义还体现在对人们信仰价值观的塑造起到激励作用。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以人生观、世界观、信仰观为教育内容之根基,鼓励人们独立思考,自由思想,建立个体自身的主义。杨昌济在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思索中实现了自我精神的成长,从而树立了自己的信仰观,他关注社会,联系实际,审慎思考,为社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从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德性品格和深刻思想,激励着人们找寻自己的人生信仰和生命意义。

5. 对个体生命发展的意义

杨昌济教育伦理思想中的生命教育伦理思想旨在告诉人们理解尊重生命和发展生命,杨昌济向人们传递了他对于生命的态度看法和生命发展的意见,他从个体自我生命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中论述了个体自利的合理性及个体生命的相对独立性,这为社会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个体生命的发展。同时杨昌济也从婚育、择业等生活角度分享了他对于生命发展的看法,这对人们实现个体生命的自我发展无不是一种参考。

6. 对促进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意义

杨昌济教育伦理学不仅体现着家国情怀,还具有世界眼光。杨昌济将孔德的“人道”思想和康德、利勃斯的“人格论”结合起来,用于阐发人类世界的一体性,正如杨昌济所说的那样,“重人格必重人道,爱国家必爱世界”,杨昌济这一教育伦理思想对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 [1] 杨开智. 回忆父亲杨昌济先生[C]//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10.
- [2] 王泽应. 论杨昌济伦理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3(6):44.
- [3] [63] [64] [65] [67] [68] [70] 杨昌济. 杨昌济集[M]. 王兴国, 编.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10, 54, 54, 53, 56, 71, 53.
- [4] [5] 王正平. 教育伦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168, 168.
- [6] [7] [8] [9] [10] [1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54] [61] [73] [74]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杨昌济. 教育学讲义[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191, 192, 192, 192, 193, 95, 207, 1207-208, 208, 231, 233, 233, 245, 248, 24, 198, 183, 200, 197, 214, 215, 218-219, 219, 220, 221, 222, 223, 223, 223, 224, 224.
- [12] [13] [21] [43] [44] [91] [92] 杨昌济. 教育泛论[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150, 151, 149, 150, 150, 151, 151.
- [14] 杨昌济. 劝学篇[Z]. 公言, 1914:65.
- [15] [16] 杨昌济. 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175, 175.
- [17] [18] [19] [66] [71] 杨昌济. 劝学篇[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4, 4-5, 4, 6, 6.
- [20] [22] [52] [53] 杨昌济. 告学生[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64, 64, 63, 63.
- [23] [25] 杨昌济. 教育上应注意之点[J]. 湖南教育杂志, 1913, (16):19, 12.
- [24] [26] 杨昌济. 达化斋日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28, 89.
- [27] 杨昌济. 告学生[Z]. 国民, 1919:36.
- [28] [29] [30] [31] 杨昌济. 余改良社会之意见[Z]. 公言, 1913:72, 83, 85, 86.
- [41] [42] 杨昌济. 讲堂训谕[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252, 252-253.
- [45] [46] [47] [49] [50] [51] 杨昌济. 记英国教育之情形[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159, 159, 159, 159, 160, 160.

- [48] 杨昌济. 教育与政治[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64.
- [55]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44.
- [56] [62] 杨昌济. 宗教论[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1, 11.
- [57] [58] [59] [60] [75] [76] [77] 杨昌济. 西洋伦理学史之摘录[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40, 141, 141, 138 - 139, 139 - 140, 139, 140.
- [69] 杨昌济. 达化斋日记(校订本)[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47, 91.
- [72] 杨昌济. 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8: 59.
- [78] 杨昌济. 教育上当注意之点[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67.
- [93] [94] [95] [96] [98] [99] [100] [101] [102] 杨昌济. 治生篇[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05, 106, 106, 107, 108, 109, 110, 112, 112.
- [97] 杨昌济. 改良家族制度札记[C]//王兴国, 编注. 杨昌济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 103 - 116.